



当代北欧短篇小说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北欧短篇小说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 插页 8 字数 334,000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400

书号: 10188·602

定价: 2.55 元

序

冯 至

给别人写的或译的书作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熟悉书的内容，把书介绍给读者，或进一步对内容作些分析评论，供读者参考，甚至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那本书。另一种是作序的人并不熟悉书的内容，而认为这样的书目前很需要，有一部分人在等候它的出版，同时对著者或译者有一定的了解，因而乐于写序，以表达殷切的期望之情。前一种序当然是重要的，也是读者所欢迎的；但后一种也不无意义，未可厚非。我这篇序属于后者。首先，我对于当代北欧文学是外行；其次，这些短篇小说我没有读过。本书的编译者石琴娥同志虽口头上向我介绍过一些小说的内容，但我不愿一知半解地妄加评议。我只能谈一谈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抱有殷切的期望。

我之所以希望能早日读到这本书，主要因为它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精心选辑的当代北欧短篇小说集。回想五四以来，翻译过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名著以及一般性的作品，可是北欧五个国家的文学，虽然有过鲁迅、茅盾的提倡，介绍却是很不够的。当然，易卜生的戏剧、布兰代斯的文学史著作，在中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安徒生的

童话陶冶了千千万万中国儿童的心灵，丰富了他们的幻想，但除此以外，关于北欧文学，我们知道的就很有限了。就以斯特林堡而论，译成中文的也只是东鳞西爪，难以看到这个大作家作品的全貌。形成这个局面的客观原因主要是通晓北欧语言的人太少，更谈不上研究北欧文学。过去翻译的为数不多的北欧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过英语转译。近些年来，由于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日益频繁，学习北欧语言的人逐渐增多，其中也有人研究北欧文学，译介北欧的作品，而且是直接通过北欧国家的语言。这部当代北欧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正好适逢其会，它使读者能从不同角度而又比较集中地了解北欧人怎样生活，怎样思想，文艺界有什么流派，有什么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我不懂北欧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更谈不上懂得它们的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但由于我在八年前到北欧五国作过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五年前又被邀请到瑞典、丹麦住过三个星期，那里的山水人物曾给我以难忘的印象，我对他们产生一种深厚的情谊。我希望能在这本选集中某些（不是所有的）短篇里再一次看到那里的山水人物，重温一次往日的情谊。

我初次访问北欧，是在1977年从9月17日至11月14日，北京出发时，粉碎“四人帮”还未满一年。经过十年浩劫，与国外隔绝，到了从前没有到过的北欧，一踏上那里的土地，便感到耳目一新，许多事物跟我原来设想的几乎完全两样。最显著的是位置接近北极圈的冰岛，顾名思义，那里该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想不到地下高温的喷泉给冰岛的居民送

来永恒的温暖，冬季都可以露天游泳。岛的绝大部分被火山爆发时喷吐出来的熔岩覆盖，可耕地只占全岛面积的百分之一二，人口不过二十几万，可是冰岛人把沿海可以居住的城市建设得妩媚多姿，别饶风趣。冰岛曾长期隶属于挪威和丹麦，直到1944年才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但是它保留了北欧最古老的文化。从十二世纪起，冰岛人就用《埃达》诗体歌颂了民族大迁徙后与基督教传入以前的北欧的神话与英雄传说。他们更多地写出西欧最早的散文之一“萨迦”，记载了氏族与氏族之间、国王与国王之间无止无休的争夺，以及海盗侵扰欧洲沿海各地的事迹。《埃达》富于幻想，“萨迦”是客观的记实，不加粉饰。一个冰岛的朋友自豪地说：“在中世纪，丹麦、瑞典、挪威的国王们争夺领土，人们忙于打仗，我们的祖先却在和平的冰岛用羊皮纸写下来北欧古代的史实和神话。”

在中世纪，丹麦和瑞典都各自有过一个时期称雄一世。丹麦女王玛格蕾特一世曾把挪威、瑞典合并于她的统治之下。十六世纪瑞典独立后，十七世纪便指兵南下，参加了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三十年战争。只有挪威经常处于弱势，时而隶属丹麦，时而与瑞典联合，直到1905年才取得独立。可是它的文学艺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放异彩，易卜生的戏剧、格里格的音乐、蒙克的绘画，都是举世闻名。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保·恩斯特的信里说：“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挪威于1814年脱离丹麦与瑞典联合时，

制定了一部宪法，恩格斯在同一信里说，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至于挪威的奇山异水，绚烂的秋林，汽车从那里驶过，好象永无止境，因此在我的记忆里也永未消失。

丹麦和瑞典都曾经扩大领土，侵略邻邦，十八世纪以后，它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境内，争端渐趋平息，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也就应运而生。在丹麦，且不提欧登塞安徒生的故居吸引了多少从世界各地来的旅客和儿童，就以哥本哈根大学而论，一位文学教授引导我走进一间可容二三百人的课室，他说，布兰代斯曾在这里讲授欧洲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随后他指着窗外的一条街说，一百二十年前克尔恺郭尔天天在这里散步。我想，这位愤世嫉俗、对欧美现代哲学发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于1855年在散步时昏倒死去，也许就是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

在五个国家中间，以人口而论，瑞典可以说是蔚然大国，因为除人口稀少的冰岛外，其他三国人口的数目都在四百万与五百万左右，而瑞典的人口则有八百多万。瑞典在十五世纪就在乌普萨拉建立了大学，瑞典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跟这个大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能在梦幻中与神鬼交往的神秘哲学家斯维登堡，给植物分科立目，在生物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林奈，从自然主义转变为超现实主义的斯特林堡，——有的在那里学习过，有的在那里工作过，至今在乌普萨拉人们还乐于谈讲他们的轶闻趣事。从1901年起颁发的诺贝尔奖金，虽未必很公允，但对世界上

科学与文学的成就起了一定的鼓励作用。

种族和语言与前边四个国家的人民截然不同的芬兰人，在远古时代从亚洲迁移到北欧的东北角，在被称为“千湖之国”的地区安家落户。十二世纪他们被瑞典人征服，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又划入俄国的版图，1917年十月革命后才取得独立。这个长期被异族统治的民族并没有忘却基督教传入以前他们祖先所歌唱的神话与英雄传说。这些歌谣代代相传，在人民口中保存了数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才由一位学者把它们连串起来，整理成长篇史诗《卡勒瓦拉》。《卡勒瓦拉》不仅可与冰岛的《埃达》遥相呼应，就是与印度、希腊的史诗相比，也无逊色。

以上说的大都是历史上的旧话，但对于我这样一个生疏的旅客，初次听闻，也有新鲜之感。下边再说些半新半旧的话，以便进入我所听到和看到的“当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冰岛还属于丹麦，芬兰隶属俄国，那时所谓的北欧，从政治上看只不过是丹麦、瑞典、挪威三个王国。这三个国家严守中立，人民过着和平的生活，给人以世外桃源之感。到了三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猖狂肆虐，欧洲的列强也剑拔弩张，北欧国家虽然内部也存在着阶级斗争，但表面上还是与世无争，一片和平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们和平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先是苏芬战争，随后是丹麦、挪威被法西斯德国占领，英美的军队也进入冰岛，只剩下瑞典保持中立，收容了不少德国、丹麦、挪威反法西斯的流亡者。战后，这五个国家的议会于1951年成立北欧

理事会，强调合作，互通情报。但是在欧洲东西对峙的形势下，它们有的与西方为邻，有的与东方接壤，它们的外交政策也不尽相同，所以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的只有西方的三个国家。

北欧五国，在十九世纪都是农业国，人民生计困难，有不少人迁移到美洲谋生，这在它们的文学中都有所反映。二十世纪，它们渐渐工业化，由于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民的生活也富裕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平复后，近二十年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它们的政府一般都实行福利政策，瑞典成为举世闻名的福利国家。因之它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都发生显著的变化。关于这种变化我从有限的接触中听到过一些反映。

在北欧，很难看到我们心目中的农村，我访问过几家农户，都是独自一家用机械耕种几十公顷的土地。丹麦一个农户的主人引导我参观了他清洁的饲养场和高大的机械房后，站立在他的家门前，望着广袤的田野，不无感慨地说：“这片土地从前需要五家的劳动力耕种，如今机械到农村，人口入城市，只剩下我这孤零零的一家，好不寂寞。”北海发现石油，给挪威带来财富，是一件大好事，挪威西南临海、建立于十一世纪的古老斯塔万格市很快地就变成新兴的石油城。我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早晨走进餐厅，出人意料，里边坐着许多说英语的妇女和小孩，都是与挪威合作开发石油的美国资本家的家属。这天下午，我访问一个年轻的社会学者，她正在调查开发海底石油的工人们的生活，她谈了

一些新问题后，用这样一句话作了结束：“美国人带来技术，也带来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位瑞典诗人赠给我一本诗集，封面上画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的坐在电车上，有的坐在船上，有的走在路上，男女老幼都面带笑容，中间显著地位坐着一个资本家，他洋洋得意，好象这些人的“幸福”都是他的赐予。人们看着这幅画不禁要问：这些人将要到哪里去？他们的明天和将来是否也是这样？诗人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福利国家。”与这幅画相类似，一位广播电台的台长向我说：“白天紧张工作，晚间看电视代替读书，周末到郊外一宿，这就是一般人的生活。”此外，我还听到一些问题：人们经常感到失业的威胁，有些企业都雇用廉价的外国工人。家庭的解体是不是必然的趋势？妇女解放是否只解释为性的解放？老人为了排解寂寞，是否只能把一条狗当作自己的亲人？文学的风尚往往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某个时期倾向社会批判，表示反抗，某个时期回到内心，描述隐秘的私情，是由于时代的需要，还是受到外来的影响？丹麦有人向我说，“安徒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但是瑞典一位作家跟我谈到安徒生，他说，“《皇帝的新衣》到现在还有现实意义。”——上边的那些情况和问题，我不知道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是不是有所反映？

北欧人勤劳自立的美德，给我深刻的印象。在冰岛我看见有人利用假日，一砖一瓦地筑造自己的住房。在芬兰访问一位画家，他的寓所别具风格，不同凡响，是他和他的妻子共同设计，亲手建筑的。当然，也有建筑材料公司为他

们准备好室内室外各种应有的材料，他们买来，便能象小孩堆积木那样，称心如意地把房屋堆砌起来。青年人满了十八岁便自力更生，不接受父母的资助。在冰岛和丹麦我都看见过小学生在清晨上学之前，从报社里领取一二百份报纸，挨门挨户地递送，挣得自己的零用钱。他们热爱自由民主，挪威被法西斯德国占领时，挪威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特龙黑姆附近的“抵抗博物馆”陈列着当年法西斯的种种暴行和抵抗运动中许多英勇的事迹，它不仅教育着挪威的人民，也教育着外国来的参观者。北欧的进步人士关心发展中的国家，他们中间有些作家、艺术家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旅行或作较长时期的居住，报道那里的生活，同情或支持那里人民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北欧国家除冰岛较晚外，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和我国友好地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良好的勤劳习惯，他们热爱自由民主的精神，我想，在这部小说集的某些篇章里应会有所表现。

小说集的编译者向我说过，选译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但也不排斥现代主义各种创作方法。采用什么创作方法，是作者的自由，读者可以有爱好的不同，没有权力叫作者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这些当代小说的作者在他们运用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各种创作方法的同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还继承了“萨迦”完全客观不加粉饰的朴素风格或《埃达》与《卡勒瓦拉》中神奇的幻想？是否还有斯维登堡神秘的梦幻或克尔恺郭尔的悲愤与忧郁在某些篇里流

露？

我提出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出于揣测，它们或许与小说集的内容有关，或许无关。不管怎么，我是希望我过去在北欧极短时期内的所见所闻能在这部集子里得到一些印证，享受一点与故人重逢似的快乐。所以我乐于为它写这篇序，等候它早日出版。

1985年8月6日

谈 北 欧 小 说

石琴娥

北欧五个国家——冰岛、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在最近一百年里走过了由贫穷落后的小农社会到工农业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它们以不同的遭遇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活动随着工业和技术的革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昌盛既带来了富裕，也给它们造成了新的问题和烦恼。它们的现代化“消费社会”、“繁荣国家”里人是怎么生活的，想些什么？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现实，去向往和憧憬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一切在它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出来了。

北欧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深受法国、德国文学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受到美国文学的冲击。但北欧文学有自己的民族风格 and 传统。

北欧文学中，小说的兴起大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传入北欧各国之前的北欧神话和北欧传说，即“萨迦”（saga）。“萨迦”是古挪威语，意思是“讲”，是口头讲述的故事。公元九世纪以后逐渐记载成文字。“萨迦”大体讲的是真人真事，主题一般是颂扬北欧海盜、君主杀掠征伐的功绩，讲述英

雄美人的大团圆，后来慢慢发展到虚构出来的悲欢离合故事。“萨迦”篇幅不长，但有头有尾，既可以吟唱又可以讲述，其中以冰岛的“萨迦”最为著称。这种“萨迦”文学沿续至今，不过内容和形式已大不相同。不少名作，如瑞典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 1858—1940)的《古斯泰·贝林的故事》(1891)、挪威温塞特(Sigrid Undset, 1882—1949)的《屠夫约特和维格蒂丝》(1909)、芬兰基维(Aleksis Kivi, 1834—1872)的《七兄弟》(1870)等都属此类。本书收集的《一个给孩子们的故事》就是个“萨迦”。

北欧文学在相当的长时间里和神学联系在一起。小说、诗歌、戏剧大多写《圣经》故事，解释基督教教义。这种沉闷的局面一直沿袭到十九世纪中叶。当时北欧国家由封建小农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文学艺术也开始有了突破。

1871年11月3日，丹麦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布兰代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作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一次历史性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抨击了神学对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统治和束缚，呼吁文学应该干预社会，研究有个性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神或神的意旨，要研究被宗教所强加的社会道德和两性观念所禁锢的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要为妇女的反对歧视压迫和争取自由而伸张正义，作家应该起来改革社会。布兰代斯的讲演是北欧“精神革命”的战斗宣言，它揭开了北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推动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布兰代斯的急进民主主义文学观在斯堪的纳维亚广为

传播，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开始在北欧文坛上活跃起来，其中有的作家为世界文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财富。最著名的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 (Henrik Ibsen, 1828—1906)，他发表的社会问题剧深刻揭露了社会的腐败、伪善，并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伦理道德、宗教法律和妇女解放等种种弊病和问题。在挪威、丹麦、瑞典都出现了一批敢于面对现实的大师。

但北欧这次“精神革命”的寿命却是短促的，资产阶级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之后逐渐趋向保守，他们要求平稳，唯恐丧失权益，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尚处于积聚力量的阶段。尼采的超人思想、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反理性哲学也风靡一时。连布兰代斯晚年的著作也宣扬了尼采哲学，甚至一反以往，承认宗教是有用的。易卜生从《野鸭》(1884)以后逐渐转入神秘的象征主义。曾写有揭露社会的腐朽黑暗的长篇小说《红房子》的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 (Johan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06)晚年心理变态，处于半癫狂状态，写出了一些神秘悲观的表现主义作品。

瑞典文学史教授阿尔斯特罗姆 (Gunnar Ahlström, 1906—)指出：1890年以后，北欧成长出一批新的、以奇妙幻觉、主观想象的欢乐以及唯心主义的符号取胜的作家，他们不再注意人生的思潮和社会问题。他所说的正是随着批判的写实主义陷入低潮后，唯美主义的新浪漫主义和世纪末派起来了。新浪漫派作家着重发掘人的怪诞心理活动，诸如无缘无故的欣喜若狂，突如其来的心灵苦痛，从无声处听

到低声倾诉的臆想，无忧无虑的时刻里感到有潜在危险逼近的直觉等等。世纪末派作家则悲观颓废，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挪威的擅长写历史小说的新现实主义女作家温塞特、瑞典的表现主义作家拉格尔克维斯特(Pär Lagerkvist, 1891—1974)和芬兰的西兰佩(Frans Eemil Sillanpää, 1888—1964)等作家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北欧各国先后出现了一批工人作家。他们大多自身是农村雇工或工人，有过失业、饥饿或其他痛苦的经历，经过自学成为作家，并且在青年时代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他们不仅用自己的笔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描写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而且写出来的是有很高艺术水平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些工人作家中最突出的有丹麦的尼克索(Martin Andersen Nexø, 1869—1954)，瑞典的洛-约翰松(Ivar Lo-Johanson, 1901—)和埃温德·约翰逊(Eyvind Johnson, 1900—1976)等。有成就有影响的工人作家众多或许是北欧文坛的一大特色，正是他们构成了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主体。

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北欧文学中的一个黄金时代。

近在咫尺的德国法西斯的猖獗和对外侵略，使得北欧国家陷入苦恼，不得不探索争取生存下去的办法。反苏和吹捧法西斯主义的固然不乏人在，但是希望联合苏联反对

法西斯的作家声势比较浩大，形成了反战人民文学运动。丹麦的尼克索等许多作家参加了这一运动。同时还出现了描写抵抗运动的作品如基尔克(Hans Kirk, 1898—)的小说《奴隶》(1948)、索亚(Carl Erik Soya, 1896—)的《一位客人》(1941)。在冰岛，拉克斯内斯(Halldór Kiljan Laxness, 1902—)自1929年以后走上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这时用自己的作品《冰岛的警钟》(1943)等来号召冰岛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反对异族入侵而斗争。在瑞典兴起了声讨德国法西斯、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略的“战备文学”。一批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写出了富有战斗性的作品，如洛-约翰松的《晚安吧，大地》(1933)、埃温德·约翰逊的《克里隆三部曲》(1941—1943)。表现主义大师拉格尔克维斯特在1933年，即希特勒上台的一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绞刑吏》，无情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1934年8月苏联举行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时，瑞典的马丁松(Harry Martinson, 1904—1978)和不少北欧著名作家出席参加。在挪威，年轻诗人诺达尔·格里格(Nordahl Grieg, 1902—1943)写出了告诫挪威人“千万别闭上眼睛”的战斗诗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笔从戎，于1943年在柏林上空为国捐躯。女作家温塞特不甘心在德国占领下生活而迁居美国，并发表了反法西斯主义作品《挪威的幸福生活》(1942)。

但是也有一些作家鼓吹法西斯主义，如挪威作家汉姆生(Knut Hamsun, 1859—1952)。这些人毕竟是少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和扩军备战加剧，第三次世

界大战似乎又迫在眉睫，北欧作家们感到悲观、害怕、惶惶不安、前途茫茫。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欧美一些文学思潮的影响，存在主义便成了相当多作家的信条，现代主义成为北欧文坛上的时髦，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也运用了不少现代主义表现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北欧出版的现代主义作品很多，佳作也有，如瑞典马丁松描写核战争造成世界毁灭的充满悲观色彩的诗剧《阿尼奥拉》(1956)曾在世界文坛上引人瞩目，但是不少作品甚至描写生理变态、放纵情欲、乱伦、同性恋，赤裸裸的色情描写充斥于文学作品之中，以致连有些评论家也大为反感，如隆恩奎斯特(Åke Runnquist, 1919—)对当时引起瑞典轰动的埃德隆德(Mårten Edlund, 1913—)的长篇小说《获取你所想要的东西》(1944)讥讽说：

“整整二百八十页篇幅仅仅用来描写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里有两个酗酒终日的醉汉、一个同性恋者、一个杀人犯、一批色鬼和一个女神般的母亲。一次自杀和一场谋杀比赛，另外还有母亲和女儿共享一个情夫。”(见《浪漫派违反本意》，载《四十年代》1945年第1期)

但是总的来看，现实主义文学在北欧文坛仍是主要的。“回到自然中去”，“文学的大众化”仍是北欧现实主义作家的口号。但是由于社会条件限制，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的面较狭窄，不过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和道德沦丧，“福利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问题，批判官僚统治，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却不断涌现出来。